

苏联农业透视

〔奥〕埃里克·斯特劳斯著



苏联农业透视

〔奥〕埃里克·斯特劳斯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节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rich Strauss

SOVIET AGRICULTURE IN PERSPECTIVE

Praeger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69

根据纽约普拉格出版公司 1969 年版译出

苏联农业透视

[奥]埃里克·斯特劳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节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5 字数 34,000

1974 年 1 月第 1 版 197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4171·33 定价: 0.24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是《苏联农业透视》一书的摘译，原书于1969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作者埃里克·斯特劳斯是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写过关于共同市场和苏联问题的著作多部。

原书包括三部分。第一篇：出发点，概述对苏联政治制度和农业问题性质的看法；第二篇：历史，简叙五十年来苏联农业的演变；第三篇：问题和展望；共计十一章，约二十万字。

我们摘译的是该书的最后三章——第二篇的末一章即第九章和第三篇的第十、十一两章。

《赫鲁晓夫以后》这一章叙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修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企图解救农业危机的措施和进一步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对1966—1970年五年计划的农业指标及其头三年的实绩作了一些分析。在后两章中，作者对苏联农业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和西方国家的水平作了一些对比。最后，他简略地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农业作了回顾与评论，展望了今后的发展。

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并以纯技术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作者在本书中引用和整理了不少关于苏联农业问题的资料，可以作为研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苏联农业问题的参考材料，特别是透过这些材料，我们看到苏修统治集团怎样打着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幌子，大搞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摘译一部分出来，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月

目 录

一、赫鲁晓夫以后	1
1. 回到 1958 年	2
2. 走向 1970 年	6
3. 1964—1968 年期间农业产量的趋势	11
二、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5
1. 苏联需要多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15
2. 苏联需要多少农业投资?	21
3. 苏联农产品的价格和成本有多高?	27
苏联农产品价格透视	27
生产成本的比较	32
苏联农业企业的赢利程度	33
4. 苏联的农业企业是否太大了?	40
国营农业企业的管理	42
专业化和集中	47
生产单位的规模	49
苏联的农业企业过大到了什么程度?	50
个人副业经济	57
三、苏联农业得失的评价	60
1. 从剥削农民方面退却	60
2. 克服匮乏以后	65
附录 表 I—IV	72
注释	79

一、赫鲁晓夫以后

赫鲁晓夫可能主要不是靠他在共产党统治集团中享有最高农业专家的名声而上台的，不过，他在 1958 年以后试图用来推行其农业政策的那些狂热的、混乱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措施则几乎肯定加速了他的垮台。人们粗暴地批评他的主观主义、他的考虑不当的（轻率的）计划以及他对专家意见的漠视（在这些方面，他那些不胜气恼的同僚们对他的指责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以苏联论战的标准来衡量，则这种批评是非常温和的，它还把这位声誉扫地的领袖的个人作风和那些得到统治集团广泛支持的政策清楚地区别开来。新的统治者并不谴责他的基本政策（他们自己也是要推行这些政策的），而是谴责他的领导作风、他的无视技术上的限度和他的专门依靠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做法，虽然这最后一点在整个苏联政治制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不能归咎于任何个别的人。

作为苏联政治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最高代表而出现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由于米高扬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上引退而巩固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当初米高扬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可能在帮助把权力从赫鲁晓夫转到新领导班子方面起过关键的作用）。如果他们以搞掉一个精力充沛而又令人难于捉摸的头头为满足，而不想给他加上“反党”分子的罪名，那可能只是因为在这位老上司和他的原助手之间并不真正存在着什么政策上的严重分歧的缘故。因此，总的说来，他们就以推行某些措施为满足，这些措施原是人们公认为必要的，只是过去由于具体执行中的官僚主义极端行径而有声誉扫地的危险。

1963 年的歉收及其对牲畜产量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紧急状态，

不得不把主要的重点放在可以保证生产迅速恢复的步骤上。从短期来看，这首先意味着给既是集体农庄庄员又是辅助性的宅旁园地的耕作者的农民们以更多的物质刺激。从较长时期来看，政府不得不狠抓农业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弱点，重新确定一套最后能使产量提高到国家需要水平的办法，拨给必要的资源，并针对国营农业行政管理上的一些老毛病，针对它的中央管理部门的缺乏一贯政策和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这两个主要形式的软弱无力，谋求一种新的解决办法。

1. 回到 1958 年

新领导人很想把赫鲁晓夫后期采取的失败的权宜措施所产生的问题撇在一边，而把斯大林逝世后最初五年中取得的进展巩固起来。立即需要找到一种能够打破 1963—1964 年僵局的新动力，以便赢得时间来修改一些和放弃一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 1958 年以后作出的最蛮横、最有争议的变革，是关于党和政府对农业的管理和控制的问题。新当权者们立即对此采取行动，而且明显地倾向于恢复传统的制度。他们的一批决策之一就是重新建立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而当初赫鲁晓夫曾不顾产生明显的摩擦和党的核心集团的不满，硬把地方党分成农业和工业两个机构。同样地，全苏农业部原曾被削弱并迁出了莫斯科，现也迅速得到了纠正，而它的精力充沛的头头，赫鲁晓夫最讨厌的那个 V·V·马茨凯维奇，在被放逐到新垦地区一段时期以后，也在 1965 年 2 月复了职。马茨凯维奇的后任沃洛夫钦科并没有因保护人失势而遭殃，而只是留下来任副部长，这就表明了新当权者的个人作风。在哈萨克也作了类似的调动，把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重新提升到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原职。同年晚些时候，赫鲁晓夫建立的“新垦地边疆区”被重新划分为原

来的各行政区。而各个“地区生产管理局”(这是赫鲁晓夫推行的行政改组中最重要的有效部分),重新按地方行政疆界进行了调整,同时减少了区的数目。

不过,行政改革,不管本身多么重要(特别是在官僚制度中),并不是缓和迫在眉睫的农业危机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增加用于农业的资金。这种增加曾是1958年以前农业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而在以后年份中由于这一增加的过程的中断,农业重又陷于停滞,其联系之紧密,不是用偶然的巧合解释得了的。更大的投资和更大的刺激被认为是必需的,因此几乎立即就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

最先受到考虑的产品是牛奶。从1965年1月1日起就提高了牛奶收购价格;还取消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之间的收购差价,减少了地区差价制的分区数目并取消了给予直接上市的流质牛奶的奖励价格,从而大大简化了价格结构。^①在1965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新任总书记亲自宣布一套新修订的肉类和谷物的定价办法,那时正是新生产季节开始,这些新办法当会产生最强烈的直接的影响。收购基价根据各地区情况作了大幅度的提高,废除了1958年开始实行的不分“交售”和“超额交售”的统一收购价格;1965年的谷物收购定额降低到5,570万吨,并规定在1970年前一直维持这个水平不变,肉类收购定额则从900万吨减到850万吨,以后再按一定计划增加。以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使不受收成好坏波动的影响,曾逐年改变收购价格,甚至在年度中间也有变动,但这样的做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怨言,因为它使农业生产计划的制订更加困难。为了鼓励专业化,宣称有必要规定长远的目标,特别对畜产品来说是如此,因为牲畜头数的增加和所需饲料基地的相应扩大都需要在早几年就订出计划。^②

交售定额的降低,对农民和国营农场的收入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此同时恢复了对超额交售的农产品付给高得多的奖励

价格的老办法。降低交售定额,并不是说政府想要减少收购;相反地,目的是要通过对超额交售部分支付较高价格来刺激总的收购量。这样就回到了1958年以前实行的,其实也是集体农庄开始建立以来一直就实行着的那些原则。不过,与此同时,收购基价也提高很多;小麦、裸麦、荞麦、小米和大米的收购基价提高了12%到100%以上,牛肉提高20%到55%,猪肉提高30%到75%,绵羊和山羊一般提高到10%到70%,而在山区则增加得还要多。^③在上次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时(1962年6月),零售价格也上涨了。现在这一次,当局明确规定零售价格不动,因提高收购价格而多付的费用由加工厂和政府负担。*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对食品加工工业1965年度利润的影响虽然可观,还远不是灾难性的(参看下表)。在直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各主要食品工业中,1965年的利润出现锐减的是奶品加工工业,而这一工业部门的利润本来是非常高的,曾占到全部食品工业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利润

1962—1965年

单位:十亿卢布

	1962	1963	1964	1965
轻工业	3.07	3.19	3.42	3.47
食品工业	4.44	4.70	5.39	4.64
其中:食糖	0.45	0.33	0.50	0.53
肉类	0.43	0.46	0.47	0.70
鱼类	0.21	0.36	0.54	0.37
奶类和奶制品	1.13	1.20	1.39	0.57
全部工业	18.59	19.60	21.91	22.55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749页。

《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5年,第757页。

* 1965年预算中所列21亿卢布的额外费用不应解释为对农业的价格补贴,而是政府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果。

提高收购价格不是赫鲁晓夫下台后农业净收入增加的唯一来源。还降低了对农业提供的工业品的价格，税也降低了。1965年4月10日的法令改订了对集体农庄收入征税的税则，其规定免税的部分，不仅包括付给集体农庄庄员的“正常”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基金的提成，还包括15%的平均利润，因此这种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地租的性质^④，其数额大致为过去的一半。还允许国营农场保留很大一部分利润。

当时还采用了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应急措施来迅速增加市场供应，这就是放松对农村居民个人副业的限制。差不多一夜工夫就放宽了个人饲养牲畜头数的限制，1965年初还废除了私养牲畜税，取消了对集体农庄市场价格的限制，重新允许在火车站和渡口出售农产品，还宣布了要修建更好的市场的计划。

这个政策是否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象在斯大林刚逝世后的那段时期里采用过的政策那样，须得日后才知道，因为苏联当局向来是不太愿意听任一个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得到扩大的。不管怎样，1965年农民个人副业的生产量几乎增加了8%，只比1958年略低一点^⑤，而自1958年以来一直下降的私养牲畜头数，尽管受到1963年歉收的影响，现在又开始上升了。不过，这一上升趋势在1967年又反了过来，可能表明官方对个人副业的态度又恢复正常了。

政府至少暂时是承认这个事实的，即个人副业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就马铃薯和蔬菜、肉类、奶类，特别是蛋类的供应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个人副业的产品大部分是供自己消费的，但按货币价值计算的个人副产品上市量在1964年还是占全部农产品上市量的9%和全部畜产品上市量的19%。^⑥政府对于个人副业在供应城市人口方面这一贡献，原就抱着不喜欢和不重视的官僚主义态度，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而用下述说法来提醒公众又被认为是正当的了：只有到了国营农业发展到能够满足全国对农产品

的需要时,农民的副业生产在经济上存在的理由才会消失。^⑦

私养牲畜头数

1959—1968 年

单位: 百万头

	牛(包括奶牛)	奶牛	猪	绵羊和山羊
1959 年 1 月 1 日	29.2	18.5	15.1	36.4
1965 年 1 月 1 日	25.1	16.2	14.5	30.5
1966 年 1 月 1 日	27.9	16.6	18.2	32.2
1967 年 1 月 1 日	29.3	17.1	16.5	33.3
1968 年 1 月 1 日	28.4	17.1	13.6	33.5
1969 年 1 月 1 日	27.3	16.7	12.8	34.3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 年,第 353 页起;

《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5 年,第 368 页起;中央统计局关于 1966 年到 1968 年统计数字的初步报告。

2. 走向 1970 年

1965 年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其在此后几年中指导农业政策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 1953 年 9 月的决议在那时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个决议是 1966—1970 年五年计划农业部分的基础(这个五年计划是在 1966 年 2 月以草案的形式作为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而发表的)。^⑧这个计划要求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一倍并相应增加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业机器供应量,要求给农民以更有效的物质刺激,还要求改善农业组织。

早在 1965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就宣布国营农业的投资将从 1960—1964 年的 330 亿卢布增加到不少于 710 亿。这个数字大得异乎寻常,不仅同过去的农业投资相比是这样,同工业投资的水平对照起来看也是这样,因为 1960—1964 年期间全部工业的总投资也只有 711.36 亿卢布。^⑨这样,当前计划中的农业投资将同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投资相等。也可以这样说,当前五年中公

家对农业的投资计划数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十年间公家农业投资的总额。不管这些计划能否全部实行，这些计划本身就是二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遵循着的经济优先顺序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转变。

当前的五年计划具体规定要增加供应新的拖拉机（达到 179 万台）、卡车（达到 110 万辆）、拖车（达到 90 万辆）和谷物联合收割机（达到 55 万台），这样，总的说来，就意味着要把计划期初这些设备的原有数量增加一倍。这个计划的主要特色之一是用改良土壤的方法来扩大耕地面积，这比赫鲁晓夫开垦生荒地的做法风险虽较小，但费用要大得多。计划要求在西北和远东广大地区排除沼泽地积水，在南部和东南部灌溉旱地，在大片酸性土地上撒石灰。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几个月，在 1965 年 5 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决定把这些指标中的大多数提高一倍——这种同十一年前滚雪球似地不断加码的“开垦生荒地”计划几乎完全一样的做法，不免使人对制订出伸缩性这样大的指标的计划工作的质量产生怀疑。

这个计划也认识到迫切需要更多地使用化学肥料。它的 1970 年目标是向农业部门供应 5,500 万吨（1965 年是 2,750 万吨），这比赫鲁晓夫的突击计划中规定的目标差远了，但也许正因为这个理由而较容易达到。

也许，这是间接承认苏联农业对物资的需要尤其大得几乎没有底：这个计划在投入这样巨大的基建投资、动用这样大量的现有工业产品和给予生产者这样可观的价格刺激的同时，所订的生产指标却异常平稳。它的特色之一是把它的指标表现为整个计划时期内应达到的平均成果而不是计划末一年的具体目标。在气候条件对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和几个月或一年后的畜产量水平仍有很大影响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本身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如果不作某些简化的假设而要确定预期的增长速度，那就更加困难了。

谷物仍然是苏联农业发展的关键产品,因此,当前的五年计划要求比 1961—1965 年的年平均产量增加 30%,达 1.67 亿吨。由于 1961—1965 年的平均产量是 1,303 亿吨,计划增加数实际上低于 30%。虽然比过去的计划保守,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如果不考虑年与年之间的大幅度波动,并拿丰收的 1964 年数字作基数,则需要每年稳定地增产 850 万吨(各年收成的参差不计),到 1970 年时增为 1.84 亿吨,才能达到计划所要求的目标。如果以此同赫鲁晓夫制订的到 1980 年为止的二十年远景计划中的 1970 年指标相比,肯定是大大降低了,因为远景计划里的 1970 年指标是 140 亿普特或 2.3 亿吨。相反,这个数字倒和 1959—1965 七年计划中的 1965 年指标比较接近。

苏联谷物生产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年年直线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象个阶梯,在一个气候良好的年份陡升以后,先接着来一个倒退,然后在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附近巩固下来,作为下一步前进的基础。在五十年代早期的停滞之后,接着是 1955 年增产近 2,000 万吨,由于开垦生荒地运动取得显著效果,1956 年又进一步增产 2,000 万吨。1957 年是一个痛苦的倒退,接着在 1958 年又获得一个新纪录,这个纪录一直到 1962 年才被突破。1963 年的严重歉收,看来好象要危及过去七年中所取得的全部进展了,但 1964 年又获得一个创纪录的收成,而在 1965 年东部遭受局部歉收之后,1966 年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只是这一进展到 1967 年就丧失了,因为那一年新垦地区又受到了不良气候的影响,但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个同 1964 年相似的谷物收成。

关于其他主要作物和畜产品的详细生产指标,柯西金在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到了。^⑩在 1966—1970 年期间整个农业生产总值应比上一个时期提高 25%。这等于是每年在上年的基础上增长 4.5%——这一增长速度比过去几次对农业的要求小多了,当时,计划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游戏。但是,如果作为

一种不顾坏年景必然会出现挫折而仍然要力求完成的指标来说，这还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而且，还特别强调要主要依靠提高作物单产和牲畜产品率来增加产量，虽然也要求增加牲畜饲养头数。

官方文件中经常提到要把中央统一计划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精神结合起来的那种老生常谈，反映着苏联新领导的一种真诚的，即使还不是坚定不移的努力，要在农村的利益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利益之间求得更好、更稳定的平衡。这一政策部分地表现在某些具体措施中，部分地表现在更广泛地寻找新的方法中。农民的经济状况由于收入的提高以及开支和赋税的减轻而改善了。此外，政府还勾销了集体农庄对银行的负债达十亿卢布之多，同时还使农村零售价格与城市价格一致起来。

特别重要的是最后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集体农庄“庄员”享有经常的劳动收入，以代替那种变动不定的、支付得很迟的劳动日“分红”。订了一个试行办法，探索建立集体农庄工资基金的可能性。基金一部分由农庄的货币收入提供，一部分由国家收购单位根据订购合同预支的款项提供。最后，从1966年7月1日起，按照国营农场工人的工资率并根据他们的“劳动定额”，开始对集体农民实行有保证的工资制。每月付工资两次，年终则另付特别奖金作为原来的合作制劳动日分红这一概念的残余。

这项重要改革看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集体农庄里的劳动能按合理的工资率得到报酬，那就变成了人们乐于谋求的职业，而不是要逃避的苦役了。这样，即使在农闲季节，集体农民也会愿意为农庄工作，而不是不管有无成效都把时间尽量花在宅旁园地上。当前，这个五年计划还提倡在公营的农场、农庄中以及农庄之间的联营组织中设立一些副业性的企业来利用农业人口的空闲时间，就象往昔的农村手工业那样。集体农庄庄员对确有合理报酬的工作是发生兴趣的，因此超额实现这些合情合理的计划并不是不可能的。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重大区别不在于前者那种装装门面的“合作”性质，而是在于“庄员”得不到有保证的工资。虽然将集体农庄正式改组为国营农场的运动实际上已告结束，实行有保证的工资制就事实上消除了两种国营农业之间的最重要差别。苏联领导人显然在为集体农庄寻找一种新的基础，自1965年3月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以来，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了。这就是一再宣布要召开一次新的集体农民代表大会的背景（1935年以来这样的大会还没有开过）。1966年初成立了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亲任主席的筹备委员会，准备在群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新的《集体农庄章程》。尽管有理由对人为的群众热情表示怀疑，但这项工作所花时间之长，却多少表明对待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搞这个“宪章”所花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得多，农业部到1967年才开始研究它的草案；这样的拖延无疑是一个迹象，表示在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需要长时间来解决的严重分歧。

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初期，开始按比较合理的价格收购国营农场的产品，从而使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后来随着国营经济其他部门中权力下放的趋势日益增长，国营农场也受到了这一发展的影响。有人建议应允许国营农场提出一部分利润作为本场职工的福利金，接着于1967年4月在三百九十个国营农场中实行一项试行办法。这个新办法的一部分内容是个“一揽子交易”，一面取消国营农场在收购价格上通常比集体农庄少得百分之十的这一差额，一面对国营农场所用的国家资金收取百分之一的利息。此外，农场的利润中将提出一部分用于直接有利于农场职工的用途，如奖金、改善住房条件和社会福利等。根据苏联通常的做法，这样一种试行办法可以认为是将在不久将来普遍实施的前奏。当然，这将进一步缩小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两者地位之间的差别，可能是走向这两种国营农业企业彻底同一化的又一步。

3. 1964—1968 年期间农业产量的趋势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实行这些变革,是试图保存一项他们都同意的政策的实质内容,使其不致因“枝蔓”过多而妨碍它的有效执行。这一内在的连贯性,使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以后年代里农业生产方面的实绩看成是前十年发展趋势的延续。

为了排除气候条件造成的好坏年成的极端情况,又为了尽可能依照苏联农业生产发展趋势所出现的条件,有必要把当前的实绩同 1966—1970 年五年计划的规定作一比较,同时也和前五年的平均水平作一比较。(各个别年份的数字见附录表 II 和表 III。)

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

1961—1967 年

单位: 百万吨(蛋类和羊毛除外)

	1961—1965 平均年产量	1966—1968 平均年产量	1966—1970 的计划 平均年产量	1966—1968 的平均年产量为:	
				(i) 1961—1965 平均年产量 的%	(ii) 1966—1970 计划平均年 产量的%
谷物	130.3	162.8	167	125	97
籽棉	5.0	6.0	5.6—6.0	120	100—107
甜菜	59.2	84.9	80	143	106
葵花籽	5.1	6.5	—	127	—
马铃薯	81.6	95.0	100	116	95
蔬菜	16.9	19.0	—	112	—
肉类(按屠宰重计算)	9.5	11.3	11	122	103
奶类	64.7	79.3	78	123	102
蛋类(十亿个)	28.7	33.7	34	117	99
羊毛(千吨)	362.0	39.3*	—	109	—

资料来源: 所有实际数字都引自 1969 年 1 月 26 日《真理报》; 1966—1970 年计划数字引自柯西金在二十三大上的报告。

* 此数字疑为 393.0 之误。——译者

使用上表时应把这一情况充分考虑在内：对大多数生产部门来说 1961—1965 年是一个停滞的时期，其中还包括一个特别坏的年景（对农作物来说是 1963 年，对畜产品来说是 1964 年）。当然，统计上进行阿谀的艺术就是选择一个差劲的基期，这样可以不必真的捏造骗人的数字而达到使当前成绩显得非常良好的目的。目前苏联国内常常喜欢作这样的比较，肯定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最近这段时期内所取得的进展之大和进展速度的比较均匀，确使苏联领导有理由感到相当满意。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 1966—1968 年产量和 1966—1970 年计划平均年产量之间的比较。1966 年是谷物丰收年，1967 年显然是个平年，但也不算坏，而 1968 年则春播作物很好；从当前这一五年计划时期头三年的实绩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整个五年计划的谷物指标，或许还有马铃薯指标都是能够完成的，而棉花、甜菜和大部分或全部畜产品还将大大超额完成。这次计划究竟是根据对 1970 年农产品需要量独立作出估计而制定的呢，还是对生产发展的趋势和潜力作了过份谨慎的推算而制定的，以现在所能得到的片断资料是无法断定的。从当前苏联领导小心谨慎、甚至胆小怕事的态度来看，似乎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但不管低估生产发展趋势的原因是什么，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次农业生产计划将能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大大超额完成。很能说明苏联特点的是，远在计划期结束之前，就在，比如说，奶品工业中发动一个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运动了。^⑩

苏联领导这种从头脑发热的过份乐观到调子低沉的过份谨慎的作风转变有一个有趣的后果：官方生产计划的超额完成可能会给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工作带来麻烦。1967 和 1968 两个年度的初步统计数字表明，谷物、籽棉、甜菜、葵花籽、马铃薯（不包括蔬菜）和畜产品的收购计划已超额完成。即使是蔬菜类产品，储藏设备也得跟上去，某些如甜菜一类的产品，加工设备也得跟上去，才能